

# 盧嘉興編撰臺灣歷史人物傳記的特色與動機

楊素姿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摘要

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者盧嘉興，研究的面向非常多元，累積的成果也相當豐碩。至今已受重視的主要是有關古蹟考證、宗教信仰調查及臺灣鹽業等相關研究，而對其考索歷史人物成果之論述則顯得相對匱乏。筆者根據盧嘉興所編個人〈已發表著作一覽表〉，發現其於 1965 年 9 月至 1972 年 6 月之間，曾密集撰寫歷史人物傳記，幾乎是每月一文，直到 1980 年仍有相關文章發表，有別於他過去的探討主題，這個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擬從撰寫特色切入，概論盧氏人物傳記的編撰情形，並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探究其編寫歷史人物傳記的動機。

關鍵字：臺南學、盧嘉興、臺灣歷史人物、傳記

## 壹、前言

臺南學研究學者盧嘉興（1918-1992），研究的面向非常多元，累積的成果也相當豐碩，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稱他為臺南學的重要先驅者，且嘉許他為自學成功的鄉土史調查專家，以及開始調查並撰寫臺灣傳統製鹽發展史的第一人。而除了鹽務的相關研究，該文還指出盧氏的研究志趣並展現在以下各方面，包括：明鄭時期的最初登陸地點以及有無媽祖信仰的權威論點；孔廟的改建、古蹟的維護、赤崁樓的增修；詳盡介紹臺南傳統著名的史志名家、詩藝名流、鹽商巨富的發達史跡等，且都有其「專業的獨到造詣」。<sup>1</sup>

由上述可知這位自學有成的學者，傾其畢生數十年之力奔走於臺南地區及其周邊區域進行各種田野考察，並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彙整研究，確實為後人留下了豐碩的成果，這批數量龐大的著作也由盧氏親手輯錄成《臺灣研究彙集》，共 24 輯。爾後，雖曾被重新編印出版，如臺南市文化局於 2000 年委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編校一套三冊的《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收錄盧嘉興有關臺灣古典文學家的論述共 20 篇，然而時至今日，有關盧氏本人或者對其研究成果進行學術探究的文章仍是寥寥可數。至今已發表之期刊論文有：黃靖惠〈走過日據、臺灣光復；走過鄉野、鹽田烈日：臺灣文史學人盧嘉興〉、<sup>2</sup> 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戴文鋒、楊家祈〈以多元觀點探討盧嘉興之明鄭無奉祀媽祖論〉、<sup>3</sup> 張復明〈盧嘉興臺灣鹽業研究論文之回顧與補述〉、<sup>4</sup>

1 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2022 年 10 月），頁 16-17。

2 黃靖惠，〈走過日據、臺灣光復；走過鄉野、鹽田烈日：臺灣文史學人盧嘉興〉，《社教雙月刊》，第 117 卷（2003 年 10 月），頁 61-64。

3 戴文鋒、楊家祈，〈以多元觀點探討盧嘉興之明鄭無奉祀媽祖論〉，《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2022 年 10 月），頁 23-41。

4 張復明，〈盧嘉興臺灣鹽業研究論文之回顧與補述〉，《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2022 年 10 月），頁 43-55。

邱敏捷〈盧嘉興的臺灣佛教研究〉。<sup>5</sup>

黃靖惠的文章應是於期刊介紹盧嘉興的生平及其文史研究成就的第一篇，篇幅雖短，但是由於所述內容是取自一次訪談盧氏長女盧富美的記錄，正好提供了較細膩的觀察材料，可以和盧氏友人黃天橫所寫的序文〈盧嘉興先生其人其寫作〉<sup>6</sup>一起參看。江燦騰全文從盧氏的家族史、學術系譜、治學方法及著作，論述其人開拓南臺灣鄉土史之調查與研究並奠定重要基礎，厥偉之功績使之堪稱為「臺南學」的重要先驅者。戴文鋒、楊家祈則是以盧嘉興所提出的「明鄭無奉祀媽祖論」做為全文探討的基調，文中除了肯定盧氏能首先注意並仔細釐析清代文獻中有關「偽時（明鄭時期）」所建之廟宇記錄，並肯定其論證方法與歷程可做為歷史研究之典範。然而該文並不同意盧氏的觀點，反而從民俗信仰發展的角度出發，並結合後世出土的文獻及文物重新加以檢視，最終指出盧氏之說確實受到研究材料的侷限，其內容可加以調整為「明鄭時期臺灣已有媽祖信仰，但有無建廟奉祀可有更多的討論」。張復明則是就盧氏共 21 篇鹽業研究論文進行考察，指出盧氏論文受到史料匱乏，及所處社會情勢之影響，導致論文多有可議之處。於是利用新出土史料重新檢視並補正盧氏有關臺灣製鹽之源起、古鹽場、曬鹽法及鹽務制度諸論點。邱敏捷則是關注盧嘉興的佛教研究，文中首先點出盧嘉興對臺灣佛教的研究成績斐然，再從盧氏與佛教之間的淵源明其所以然，文末並評述其臺灣佛教研究之特色、影響與侷限。從以上幾篇論文來看，至今對於盧嘉興所留下的大批資料進行研究者實在不多，研究議題也有待開發，目前已正式發表之論文，僅綜論盧嘉興的生平與研究成果，以及探討盧氏有關宗教信仰及臺灣鹽業之相關研究。

5 邱敏捷，〈盧嘉興的臺灣佛教研究〉，《臺灣文獻》，第 74 卷 2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3 年 6 月），頁 241-270。

6 黃天橫，〈盧嘉興先生其人其寫作〉，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臺南市藝術中心，2000 年 11 月），本篇序文。

筆者根據盧氏所編個人〈已發表著作一覽表〉，<sup>7</sup>發現其於1965年9月至1972年6月之間，曾密集撰寫歷史人物傳記，幾乎是每月一文，直到1980年仍有相關文章發表，有別於他過去的探討主題，這個現象很值得進一步探討。是以本文將以其有關臺灣歷史人物之論述成果進行探討，藉以拓展盧嘉興學術之研究面向。以全部共計24輯的《臺灣研究彙集》的內容，對照其於當中第21輯所自編的「已發表著作一覽表」，筆者統計當中有關臺南人物傳記主題之篇章共多達57篇。<sup>8</sup>綜觀這些傳記人物，可概分為以下幾類：一曰明朝及明鄭人物，如陳第（1541-1617）、沈有容（1557-1628）、何斌（?-?）、蔣鳳（1662-1667）、五妃等；二曰有功於建設臺灣者，如曹瑾（1787-1849）、劉銘傳（1836-1896）等；三曰以軍事守護臺灣者，如姚瑩（1785-1853）、許南英（1855-1917）等；四曰促進府城文教發展者，如林朝英（1739-1816）、鄭兼才（1758-1822）、蔡廷蘭（1801-1859）、林人文（1856-1910）、林珠浦（1868-1936）等；五曰籌建鄭成功專祠者，如沈葆楨（1820-1879）、王凱泰（1823-1875）等；六曰於保存臺灣文獻有所貢獻者，如沈光文（1612-1688）、蔡國琳（1843-1909）、楊浚（1830-1890）、林豪（1831-1918）、郭藻臣（1858-1909）等；七曰抗日文人，如林湘沅

7 盧嘉興，〈盧嘉興已發表著作一覽表〉，《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81年2月），頁47-50。

8 以一位資源相對匱乏卻又肯奮力書寫的人來說，盧嘉興能夠獨力將自己的每一篇作品保存到今天所見的樣貌，著實不容易。除了於1966年開始輯錄獨力出版自己的作品集，並且不定期整理自己的論文作品目錄（分見於《臺灣研究彙集》第4輯、7輯、10輯、21輯），當中清楚記載各篇篇名、發表的刊物、發表時間，以及收入第幾輯。不過，《臺灣研究彙集》當中的作品並非全是出自盧氏手筆，有的是報導盧氏相關事跡或是與盧氏研究有關的新聞資料、有的是友人的贈詩、有的是自己在座談會中的發言記錄（如第18輯「連雅堂先生生平事蹟座談會發言」）、有的是附錄他人所寫與自己的研究主題相關的序文，如第4輯〈臺南縣之地理與氣象陳正祥教授序〉，而比較特別的是，第18輯又另外收錄〈臺南縣之地理與氣象序〉一文，經筆者比對，二文的內容是一致的，未知其用意如何。總之，《臺灣研究彙集》收錄的篇章大體上以盧氏的論文為主，但是也雜收了不少非論文類的篇章資料，欲藉以統計盧氏的研究成果量，確實不若他自己所整理的「已發表著作一覽表」來得準確。然而表中的資料也並非全無問題，雖然盧氏自編論文序號時，也細心地將重出於不同刊物的文章予以相同編號，但編號上仍難免有誤。例如編號116，1970年發表於《古今談》的〈倡祭臺灣先賢沈光文的蘇東岳〉，另於1973年發表在《南瀛文獻》18卷合刊中，編號為161，明顯的此161當為116之誤。因此，在統計其論文作品數量時倘若忽略這些細節，所得結果將不盡相同。

(1870-1924)、楊宜綠(1877-1934)、謝國文(1887-1938)等。另外，還有一些不易歸入前面幾類的人物，比如張李德和(1893-1972)<sup>9</sup>和紀若羅(?-?)<sup>10</sup>等。

因著盧氏所處時代有著複雜而緊張的政治情狀與氛圍，其人物傳記也自帶有某些特點。本文在此主要針對其所寫傳記內容，將自己的一隅之見理出一些條理進行表述，全文首先從編撰特色切入以了解盧氏人物傳記的編撰情形，進而結合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探究其編寫臺灣歷史人物傳記的動機。

## 貳、盧嘉興書寫臺灣歷史人物傳記的特點

筆者從個人研讀並爬梳盧氏所撰 57 篇人物傳記，摘選其中較鮮明的幾個特點，並舉例式地列舉相關內容，以具體呈現各特點之所在，茲分述如下。

### 一、透過歷史人物的事蹟，整合自己文史調查事業的成果

1965 年，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榮獲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同年 1 月由「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補助刊印，該書藉由研究鹿耳門地理的變遷史，得到了鄭成功登陸臺灣的可能地點就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的顯宮

9 張李德和，出身雲林西螺望族，後嫁與嘉義名門張錦燦為妻。根據盧嘉興所載，張李氏只於 1914 年 8 月至 1916 年 8 月之間，曾在丈夫張錦燦所主持的諸峰醫院協助處理院務時，短暫居住過臺南一段時間。參見盧嘉興著，〈臺灣名女詩人張李德和女史的家世〉，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頁 1003。其一生志業主要是在嘉義區（今嘉義市）開展，創辦了詩會、畫會、詩鐘社等，對嘉義藝文界有莫大影響。可見張李氏與本文所概分的七類人物較不同。張李氏曾於 1969 年為盧氏的母親盧許綢女士寫了一首紀念詩--〈盧許綢女士法號錦妙減度四週年紀念〉（載於盧嘉興編著，《臺灣研究彙集》第八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69 年 7 月），頁 30。）隔年便以張李德和女史的家世為題撰成此篇，因此筆者推測該文可能是盧氏與張李氏之間的酬贈之作。

10 紀若羅乃一名藥商，早年追隨鄉人從福建乘船渡海來臺謀生，幫傭期間有機會接觸藥材批發行業，遂累積不少有關藥材的相關知識與專業智能，成家後於總管宮廟一帶自行經營藥材行，店號德元。由於經營得當，生意興隆，遠近馳名，故時人以其藥材行臨近的總管宮街接連南巷一帶稱為德元巷。其後代子孫紀耀宗曾以家中記有「進士」字眼的祖先牌位，前來央求盧氏協助考證其祖先是否為真正的進士，考證結果雖不符委託人的期許，然而盧氏卻因此得以挖掘出紀家渡臺祖紀若羅的發跡史。參見盧嘉興，〈紀若羅與德元巷〉，《臺灣研究彙集》第 19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79 年 7 月），頁 46-58。

里。<sup>11</sup> 同年 8 月，盧氏緊接著又於《古今談》第 7 期發表了〈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此文除了論證何斌（?-?）當初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動機乃是出於「熱愛祖國，忠於鄭氏」，他不在乎自身的安危榮辱為鄭成功執行代徵的稅務，並點出何斌如何仔細勘察鹿耳門港口周圍的深淺線路、掌握潮汐的變化情形，最終以鹿耳門港口做為引導鄭成功攻臺的最佳路線。盧氏主張何斌所展現出來的乃是民族大義，而非如清人江日昇《臺灣外記》所謂「侵用庫銀」而畏罪潛逃的可恥行為。文中引用了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所著《臺灣島史》「國姓爺進佔臺灣」當中的一段記載，證明何斌忠於鄭氏的事實。內容節錄如下：<sup>12</sup>

……於一六五六年（永曆十年）派遣了公司的通譯官及中國人的領袖何斌（Piqua），帶了信和贈品去見國姓爺和他的官吏。這個狡猾的中國人在一六五七年八月間，帶了國姓爺的非常懇切的答覆而回來了。據說禁止與臺灣通航的禁令即將取銷。一六五八年果然有空前多的中國船到臺灣來，……不過……何斌以國姓爺的稅務局長（Sauja）的名義向運往中國的一切貨物徵收輸出稅。調查的結果，知道他實在受了國姓爺的委託，以全權辦理此事，已經將一八〇、〇〇〇兩稅款寄到廈門去了。何斌就被革去了在臺灣一切職務，並且失去了契約上的利用權，並被課以罰鍰。他很機敏地逃到國姓爺那裡去，幸得免於其他的禍患。

盧嘉興據此認為，何斌即使冒著喪失自身權勢地位的危險，也要成全國姓爺的航運措施，實在是一種熱愛國家民族的表現，所謂畏罪潛逃之說，實在是

11 雖然這個論點對於主張鄭成功登陸地點在顯宮一派的說法有所呼應，然而盧氏並無意捲入鹿耳門正統媽祖廟之爭的漩渦之中。如其於《鹿耳門地理演變考》一文前言便明說，其提出與五人小組所發表〈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相左之言論，乃是基於一種超然的學術立場。參見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年），頁 4。

12 盧嘉興，〈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臺灣研究彙集》第 17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77 年），頁 91。本段內容另外可參見 Ludwig Riess 原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年），頁 196。當中所陳述者大同小異，惟有關於何斌帶書信及禮品去面見國姓爺及其官吏的年份，稍有不同，姚本做 1657 年。

「厚誣」了他。何斌熱愛祖國、忠於故主的苦心實在值得加以宣揚。路德維希·里斯是德國史學家，於 1887 年起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是促使史學成為日本的大學學科之關鍵人物，對日本的史學發展有其重要影響。《臺灣島史》（或譯作《福爾摩沙島史》）是里斯參考荷蘭史料、西方傳教士的書信及航海記錄，並參考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各類文獻，纂輯而成，其學術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sup>13</sup>可見盧氏在評價人物時，不僅能跳脫成見，且能用心援引可靠證據。

該文另一重點則是參考楊英（1600-1680）所撰《從征實錄》（或稱《先王實錄》），加上自己的文史踏查成果，點出當年何斌引導鄭成功登臺的時間和地點：<sup>14</sup>

於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清順治十八年），農曆四月初一黎明到達鹿耳門口，諸將船於上午七、八時均到達鹿耳門線外，那個時候正遇當干潮（低潮），為了等待滿潮後進港，鄭王便先行登陸北線尾踏勘營地，（鄭王的登陸臺島的第一步踏腳地，是在那個時候的鹿耳門南岸，即北線尾的北端了。其址為現在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原名媽祖宮，即臺灣碱業公司安順廠北東邊的製鹽處辦公廳附近。）在北線尾需候滿潮時進港。這是因為鹿耳門附近海潮初一、十五係正午滿潮，那天的滿潮時刻為中午十二時二十四分。

又云：

鹿耳門附近的潮差，依照筆者所查，平均是一·一公尺，約三·五臺尺，較大潮為一·六公尺約五臺尺。所以鄭延平利用大潮日的滿潮時候，待潮水飽漲到達頂點從鹿耳門進入臺江。……何斌對潮汐的探究至為精細。因為每月潮水最大的是初三及十八

13 Ludwig Riess 原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頁 12-13。

14 盧嘉興，〈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臺灣研究彙集》第 17 輯，頁 91。



兩天，而初一、十五就是起潮的日期，因此鄭延平王進入鹿耳門選擇初一日是潮水起潮的時候，在四、五日內潮水較大，可以行駛自如的在臺江內海作戰。且可以利用潮大臺江內海水深，由鹿耳門抵達赤嵌—即今臺南市區，得以避過大員熱鬧遮城巨砲的轟擊範圍，順利登陸赤嵌。

藉由敘寫何斌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史實，連結自己七年來任職臺鹽安南區安順廠，因著地利之便考查鹿耳門地理演變的成果，指出鄭成功登陸臺灣所踏上的第一塊土地，就是位於臺南市安南區的顯宮里。撰寫歷史人物的事蹟，成了作者展現田調成果的另一種平台。從該文可以得知盧嘉興考據工作的細膩程度，並且經由對鹿耳門的潮差情形加以細密分析之後，使得鄭成功順利登臺一事，從所謂的「天意默助」之說，一轉而為何斌事先詳確探測的「人為之功」，不只為鄭成功登臺之地位於顯宮之說，找到相應的史料，<sup>15</sup>並且也提供世人重新看待何斌這個歷史人物的不同視角。

除此之外，盧氏於發表《鹿耳門地理演變考》之後的隔年，另外發表二文：〈建設臺灣南部水利的曹謹〉、〈鴉片戰役守護臺灣的姚瑩〉，文中提到鹿耳門的形勢地位時，也總是在論述中強調其舊址位於顯宮里。<sup>16</sup> 1967年發表〈有賢名的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文中講述鄭兼才與林朝英等人共同防禦海寇蔡牽（1761-1809）的功績時，提及嘉慶10年（1805）鄭兼才會試落第復返台抵任時，適逢蔡牽武裝攻打鹿耳門，於時蔡牽放火燒鹿耳門南

15 盧嘉興在〈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文末，指出江日昇《臺灣外記》所載鄭成功於遙見鹿耳門時，「命設香案，冠帶叩祝」而獲皇天列祖默祐，助其潮水「加漲有丈餘」一事，可能是對《從征實錄》的「天意默助也」句，加以神化的描述而得。並且說明當中所謂「加漲丈餘」之說實不可信，因為「如果那天真正加漲丈餘，不但北線尾、大員，甚至赤嵌沿海地方均須受到海潮的淹沒，加漲數尺也不得了。」因為依照「鄭氏軍備圖」（按：應指《永曆十八年軍備圖》）所示「此港（鹿耳門）原只柒尺深，至偽藩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流開，則有壹丈柒尺深，所以大船得由此而進，今港底之沙復填塞，依舊柒尺深。」亦即只要經過細密規劃，充份利用潮差現象，鹿耳門港已然能夠納載大船，無須藉由神助。載《臺灣研究彙集》第17輯，頁91。

16 〈建設臺灣南部水利的曹謹〉云：「臺灣為一鎮標，……起初班兵戍滿，都集鹿耳門（舊址在現在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土名媽祖宮，臺灣碱業公司安順廠東北邊製鹽處辦公廳附近）配舟內渡，……」載《臺灣研究彙集》第18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78年7月），頁71。〈鴉片戰役守護臺灣的姚瑩〉云：「姚氏於十八年蒞任臺灣道，十九年因粵東查辦洋船，恐其竄入臺洋，即飭水師防守各口，……於六月十八日申刻（下午三、四點）在鹿耳門汛口（即現在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土名媽祖宮附近）瞭見雙桅洋船一隻，由西邊駛至鹿耳門外馬鬃隙深水外洋遊弋。」載《臺灣研究彙集》第18輯，頁74。

岸，即北汕尾島北端的文館和武館，以逼近天后宮，所幸天后宮未被延燒而倖存之事。盧氏接著於底下括號說明：

當時鹿耳門地理情形請參閱附圖（一）鹿耳連帆圖，天后宮遺址位置在現在臺灣碱業公司安順廠東北邊，土名媽祖宮即現在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北邊鹿耳門溪北畔處，詳細情形請參閱拙撰《鹿耳門地理演變考》。<sup>17</sup>

文中還特別附上繪於 1807 年的「鹿耳連帆圖」，藉以標示事件中提及的文、武館與媽祖宮的相對位置。另於〈明鄭忠貞不二的將領蔣鳳〉文中述及蔣鳳的忠義事蹟時，乃從何斌如何縝密規劃鄭成功登陸鹿耳門順利進軍臺灣說起，並再次強調其現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sup>18</sup>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盧嘉興寫人物傳記，一方面是為了統合他的文史考察成果，同時也能藉以拓展自己所主張論點的能見度。

## 二、人物傳記中大量保留歷史人物珍貴遺作

如〈清末臺灣繪梅的藝術家郭藻臣〉一文，<sup>19</sup>盧嘉興除了依據郭藻臣現存書畫為郭氏立傳，並且也收錄了他的詩作。郭氏生前雖以市字賣畫為主，實則通經史、擅長畫梅且精於草書，只可惜作品未曾出版。1953 年《臺南文化》3 卷 3 期〈史料叢輯之二：藻臣遺錄〉曾載錄郭氏的遺著，不過當中並未見書畫作品，大多屬簡牘書信，並夾雜聯語、穀帳、藥方等。<sup>20</sup>其書畫作品則有賴盧嘉興於文中以附圖方式加以載錄，以饗世人。郭氏既以市字賣畫為生，作品當不在少數，只可惜至今皆散居各處。盧氏文中只呈現四件作品：草書作品一、繪蘭作品一及二幅繪梅之作，這些作品的圖版應該都是盧

17 盧嘉興，〈有賢名的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臺灣研究彙集》第 4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67 年 10 月），頁 14。

18 盧嘉興，〈明鄭忠貞不二的將領蔣鳳〉，《臺灣研究彙集》第 2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67 年 4 月），頁 19。

19 盧嘉興，〈清末臺灣繪梅的藝術家郭藻臣〉，《臺灣研究彙集》第 5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68 年 3 月），頁 13-18。

20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史料叢集之二：藻臣遺錄〉，《臺南文化》，第 3 卷 3 期（1953 年 11 月），頁 78。

氏透過田調努力走訪，蒙收藏者大方出示，<sup>21</sup>再由臺南市政府攝影專家王廷壽協助拍攝而得。<sup>22</sup>此外，由於郭氏每每在畫作上題字，因此盧氏又集得郭氏詩作共 6 首，包括七律 1 首、七絕 4 首、五絕 1 首。

1969 年盧嘉興發表〈著「仄韻聲律啟蒙」的林珠浦〉，內文中以近 16 頁的篇幅載錄林珠浦的《仄韻聲律啟蒙》，以及近七頁的篇幅收錄林氏所著詩鐘格式共十六格及其例句。這種寫作方式雖然不盡理想，但盧嘉興也交待了其之所以不得不如此的原因：

茲因林著《仄韻聲律啟蒙》自初版後未再重刊（經函蘭記書局復示）現珍藏者甚少，以初學詩韻的人很難窺其全貌。茲將全書不惜篇幅（謄）錄供讀者參閱，以便於初學詩韻者之參考。<sup>23</sup>

可見為人物立傳是他藉以保留珍貴文獻的一種方式。此文獻所以珍貴，一方面是因為日治時期得以漢文著書發刊的科舉文士並不多見，林珠浦得以前清秀才身份編著《仄韻聲律啟蒙》（《詩鐘格》一卷附於其後），且獲蘭記書局刊印發行，實在非常難得。另一方面，該書是在車萬育（1632-1705）《聲律啟蒙》的基礎上編撰而成，林氏有感於車氏之作僅列平聲，而缺乏上、去、入聲，以此做為訓蒙書籍實在不夠全備，於是仿車氏之例增補了上、去、入聲共七十六韻。謝紹楷（?-?) 嘗為之作序云：

四聲之設，所以便詞賦，而利於用韻。……然有平無仄，學者於平者，或能了了；而於仄音，則茫乎不知；究多偏廢，是猶管中窺豹，未睹全斑也。……今林逢春先生，字珠浦，素能詩，長於吟詠；因舊學之聲律啟蒙，再新撰仄音七十六韻，上、去、入三聲俱備。延作塾本，以示童蒙，俾後之學者；或習作歌賦，

21 盧氏於文中均詳細交待郭氏作品的收藏處，如提到所見郭氏所繪墨梅時，底下即括號說明畫作「現為黃百祿先生所珍藏」、「現為沈壽全先生所珍藏」等。

22 參見盧嘉興書於〈清末臺灣繪梅的藝術家郭藻臣〉文末所附致謝文字。（引自盧嘉興，〈清末臺灣繪梅的藝術家郭藻臣〉，《臺灣研究叢集》第 5 輯，頁 18。）

23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著「仄韻聲律啟蒙」的林珠浦〉，《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臺南：南市藝術中心，2000 年），頁 480。

一閱而知為某韻某韻，則胸有成竹，不致貽誤，以免檢拾之勞。<sup>24</sup>

車萬育《聲律啟蒙》在四聲各韻之下附以對仗工整的字句，目的便是幫助初學者熟悉各韻韻字，便利作詩時能夠正確用韻。而林珠浦以其深厚的韻學基礎增補了仄聲韻的部分，更是大大俾利後學。盧氏評曰：「（《仄韻聲律啟蒙》）堪稱為韻學啟蒙的良書，和車萬育所著平韻《聲律啟蒙》相配並用，功用益彰。」<sup>25</sup> 1930 年林氏應蘇東岳（1902-1957）之聘，前往善化設塾教學時，日間講課便以此書做為學童的啟蒙課本之一，夜間則藉以對成人講解詩法，為善化一地詩學開創新局。後由王滄海（？-？）、蘇東岳等人發起分別成立「浣溪吟社」及「淡如吟社」，於每月朔日輪開擊鉢會，「淡如吟社」甚至參加過全島聯吟，<sup>26</sup> 則林珠浦提振臺灣詩風之功可見一斑。

盧嘉興珍視前賢遺作的精神，在〈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文中同樣展露無遺。胡南溟（1860-1933）乃清末甲午戰役之後，由大陸渡海返臺受日本人統治的一介文人，服務於報界，與連橫（1878-1936）共事多年。其文采汪洋恣肆，雄偉奔放，連橫云：「臺南胡南溟，狂士也。文狂，詩狂；而人遂以為狂。然每一篇出，讀者咋舌。」<sup>27</sup> 盧嘉興亦評其文曰：

胡氏的文章，千奇百變，他的文氣雄大而光明，他的文詞壯麗而沈博，他的筆鋒渾灑而圓轉，並能擺脫了古人的窠臼。<sup>28</sup>

評其詩則曰：

胡氏的詩，汪洋浩蕩，收羅極廣，議論尤新，構想瑰瑋，用

24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記日治時期著仄韻聲律啟蒙的林珠浦〉，《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頁 478-479。

25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記日治時期著仄韻聲律啟蒙的林珠浦〉，《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頁 496。

26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記日治時期著仄韻聲律啟蒙的林珠浦〉，《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頁 505。

27 本段文字出自於連橫《臺灣詩乘》下篇，刊印本並未刊載，乃盧嘉興摘自楊雲萍所珍藏的連氏手稿。參見盧嘉興，〈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頁 324。

28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頁 334。

詞綺麗洋洋大觀，胡氏真是臺灣詩壇的一怪傑。<sup>29</sup>

儘管胡南溟天賦過人，才華洋溢，然身世卻極為坎坷。於報館工作時突然接獲愛妻急逝的消息，因不堪打擊，從此精神發生異狀。所幸經過醫治後，其學識尚得以復原，晚年曾自己謄錄早年的詩文作品，後來被裝訂成3冊，最終定名為《浩氣集》。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胡氏的大部分遺稿都遭毀壞，僅存此《浩氣集》3冊。後人頗為胡南溟身後作品之不傳而感嘆，盧氏亦然。偶然間得獲胡氏遺稿收藏者惠借資料，慶幸胡氏詩稿雖多散佚，然尚不乏蒐集保存者，於是開展了查訪胡氏佚文的田調工作。他並且將所得資料加以梳理撰成此文，乃意在「拋磚引玉」，期待胡氏遺稿或詩文的珍藏者能夠共襄盛舉，一起將胡氏的遺作彙集成冊並加以刊印。<sup>30</sup> 盧氏將蒐集而得的胡氏詩文作品約113件，<sup>31</sup> 盡可能地藉由記述傳主生平事蹟的同時加以載錄。其中還包括一篇長達700字的〈湘江曲〉，以及一篇長達2千多字的〈五曲序〉，可見為能保留前人的作品，盧嘉興是如何地不惜篇幅。

### 三、展現文物遺蹟與書面文獻之間的互證精神

盧嘉興早期曾參與由南縣文獻會所組成的5人小組，與石暘睢（1898-1964）、莊松林（1910-1974）、江家錦（1897-1992）、吳新榮（1907-1967）一起進行踏查抄錄古碑文的工作。<sup>32</sup> 在他們聯名發表的〈南縣古碑零拾（一）〉曾對文史踏查同好提出了重要的提醒，當中的第一點便是「文獻是不能單靠紙上資料，還要找尋文物遺蹟，加以糾謬補闕的。」<sup>33</sup> 這個理念不單是實踐在盧氏努力不懈的田調工作中，也將書面資料及文物遺蹟的整合成果，透過寫作人物傳記加以呈現。

29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頁355。

30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頁381-382。

31 此數據乃筆者依據〈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全文爬梳統計而得。

32 賴建銘，〈石暘睢先生年表〉，《南瀛文獻》，第10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5年6月），頁49。

33 石暘睢、吳新榮、盧家興、朱鋒、江家錦，〈南縣古碑零拾（一）〉，《南瀛文獻》，第2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5年6月），頁124。

盧氏寫過講述明朝大將沈有容英勇事蹟的兩篇文章，其中〈明季剿倭寇最先攻臺灣的沈有容〉<sup>34</sup>提到沈有容遠征東藩剿滅倭寇、諭退紅毛蕃韋麻郎，以及兵不血刃擄獲 69 名倭寇等戰功。當時關於沈有容遠征東藩的記載，除了有閩省文士撰文詠詩，還有陳第隨征歸還大陸後所撰〈東蕃記〉可以為證；諭退紅毛蕃之事，則有尚存於馬公天后宮內的一條刻有「沈有容退紅毛番韋麻郎」的石碑堪證。至於東沙擒倭一事，雖有閩省文士所詠贈的詩賦，然終歸缺乏具體史蹟的直接史料。所幸後來承蒙朱玖瑩（1898-1996）轉贈的「大埔石刻」拓本，始得此件史實之確據，於是盧嘉興另撰〈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與董應舉〉。<sup>35</sup>當中提到的「大埔石刻」乃董應舉所題勒，內容正記載著萬曆年間，沈有容於東沙生擒進犯福建的 69 名倭寇的英勇事蹟。盧氏於文末並盛讚某公能識得此石刻之歷史價值並加以拓製之舉，而這也正好呼應〈南縣古碑零拾（一）〉中的第二點提醒：「文獻工作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而是多數人的精神活動」。<sup>36</sup>

1966 年 12 月，盧氏發表了〈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並以「清代臺灣唯一藝術家」標榜林朝英的藝術成就，此舉應該是受到日本漢學家兼考古大家尾崎秀真（1874-1949）的影響。1930 年尾崎氏於臺南社教館所舉辦的紀念演講會時，以「清朝時代的臺灣文化」為題進行演講，當中提到：

清代的臺灣文化，……大體言之，作為一個藝術家，如詩人或書家、畫家等，而能拿作代表的，唯有「一峯亭」林朝英一位而已。……，在二百五十年之長期間，由於僅一位的事實，現在說清代期間的臺灣文化，已經等於滅亡沒有留痕跡，亦當不為過。<sup>37</sup>

34 盧嘉興，〈明季剿倭寇最先攻臺灣的沈有容〉，《臺灣研究彙集》第 3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67 年 7 月），頁 13-20。

35 盧嘉興，〈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與董應舉〉，《臺灣研究彙集》第 4 輯，頁 20-24。

36 石暘睢等，〈南縣古碑零拾（一）〉，《南瀛文獻》，第 2 卷，頁 124。

37 此篇演講稿原刊於《臺灣文化史說》，盧氏於〈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文中有所引用，載《臺灣研究彙集》第 2 輯，頁 1。本文將當中部分內容逐錄於此以資說明。

雖然尾崎氏也特別強調其所謂唯一，並非指清代二百五十年之間只產出一位藝術家，乃特別是指這期間遺作數量之多，足以陳列於史料展覽會程度的臺灣藝術家，只有林朝英一人，然而仍不免過於主觀而有所偏頗。由於尾崎秀真於日治時期曾在臺灣擔任報刊編輯、主筆，也曾參與臺灣史的修訂，並與眾多文人交流結社，據此推估他的言論應該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因此，盧嘉興論及林朝英的藝術成就時，也就採用了尾崎氏的說法，甚至還以此做為文章的標題。

不過，當多數人都以社會賢達之姿評價林朝英的成就時，盧氏已能正視其藝術成就，<sup>38</sup>從而盡可能地搜集並整理與林氏有關的各種史料和傳世文物，包括林朝英親書的「一峯亭」木匾、各種書體的對聯，以及墨竹、古梅等畫作，交待作品的創作時間及地點之餘，且對林氏的書法及繪畫風格予以分析，所謂「書法則真、草、隸、篆無美不臻，畫本則濃、淡、淺、深無不有」。<sup>39</sup>盧嘉興對於林朝英藝術成就之探究還不僅止於此，先前曾因為一直遍尋不著林朝英的自繪像，而感到「縈縈於懷」，爾後，終於有機會於林氏後裔處瞻仰此畫像。<sup>40</sup>由於「是前清臺灣名人的真像之一」，實屬難得，因此盧氏復於1973年6月撰寫〈清代臺灣藝術家林朝英〉，文中列舉的圖版除了林朝英的自繪像，還有後來持續踏查而得見的林氏墨寶，如「鵝群體書」、「荷花」等。相較於六年前所寫的〈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除了介紹林朝英的藝術成就，也不免兼論其為世人所稱道的善行，本篇則可說是論述林朝英藝術成就的專文。篇末更肯定地說：「他（林朝英）的藝術成就遠勝過事業的成功」。這種持續不斷考求文物的表現，也正是「文獻工作不是短暫的，是長期研究」的最佳註腳。<sup>41</sup>

38 連橫，《臺灣通史》卷34已述及林朝英「工墨畫，瀟灑出塵，書亦奇秀，多作竹葉形。善彫刻，竹頭木癭，一經其手，靡不成器」，且將之歸於列傳之下的「文苑」類。盧嘉興或許從中獲得啟發從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文苑〉，《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67479#p68>，檢索日期：2023年3月15日。

39 盧嘉興，〈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臺灣研究彙輯》第2輯，頁1-5。

40 盧嘉興，〈清代臺灣藝術家林朝英〉，《臺灣研究彙集》第13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73年6月），頁1。

41 石暘睢等，〈南縣古碑零拾（一）〉，《南瀛文獻》，第2卷，頁124。

#### 四、傳主普遍具有鮮明之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操

盧嘉興所書寫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在不同方面對於臺灣有所貢獻，或者是才華或德行方面足堪表揚者。不過當中較特別的是，他對某些傳主還會特別強調其人具有鮮明的民族意識以及愛國情操。例如：〈協助臺南抗日的許南英〉文中，盧氏評曰：「許氏生平以梅自況，情感真摯，從無虛飾熱心政事，不為流俗所污。愛國家，富時代意識，超然非尋常科第人物所可及」；又云：「許氏是臺南的名士，富有民族意識的詩人」。<sup>42</sup>對於許南英二度參加會試，皆因批評國事及時事的言論過於激烈而遭黜放，盧氏認為這正是出於愛國心切而不計個人利害的表現。許南英第三次會試雖順利考取進士，卻毅然選擇告假回籍服務桑梓，盧氏亦盛讚這種淡泊名利的表現，與一般讀書人參加科舉以干祿者迥異。凡此盧氏皆予以極高的評價。

另有一批為盧氏所標榜熱愛中國文化、深具民族意識的人物，便是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詩社的文人。乙未割臺之前，臺灣詩社主要是做為文人之間舞文弄墨的場域，然而在這之後，科舉夢碎，這些同病相憐的讀書人便透過詩社聚集，一方面藉由彼此唱酬，互道心聲；一方面則是不願屈從於日本人的同化政策，唯恐在這種「滅根」措施之下漢文將被廢盡，於是當中富有民族意識的詩人在憂心之餘，便藉著這種仍被日本政府視為合法組織的詩社，以延續漢文的命脈。<sup>43</sup>盧氏所寫列傳人物，正好為我們記錄了一批愛國文人如何藉著倡立詩社，讌集酬唱，憑著詩文以維持國學於不墜的事蹟。如〈日治時期為臺灣倡設詩社的林湘沅〉文中，記載日治時期原本矢志不仕的前清秀才林馨蘭，字湘沅，因看清日人有意消滅中國文化，終不忍坐視任其摧殘，於是起而護衛國學的種種行動。盧嘉興評論林湘沅曰：

林氏的生平，富有民族意識，在異族統治下不願參政，不求名利，為保存中文於不墜，出任各報中文記者，藉輿論為持續之

42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協防臺南抗日的許南英〉，《臺灣古典文學家論集》上冊，頁 139。

43 參見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 卷 3 期（1997 年 9 月），頁 76-80。



工具，為謀保存之良途需要發展詩學，以寓詩來保存國學，所以倡設詩社不遺餘力。<sup>44</sup>

可見盧氏對於林湘沅畢生致力於發展詩學，倡立詩社以護衛國學之作為，甚表讚揚。另一方面也感慨其遺作未能刊行，除了廣泛蒐集抄錄其所遺留於世的詩詞作品，<sup>45</sup>並藉以號召仍珍藏林氏詩文的諸家抄贈，力求能將林氏的遺作集錄得更加完備，可見其撰成林氏傳記以保留其遺作之用意。

日治時期由臺灣人創立的詩社成員中，也頗不乏具民族意識的抗日文人，如楊宜綠。楊氏為「南社」社員，於1915年赴日深造，在東京時結識了不少由大陸流寓日本的名人及留學生。當時中國正由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魯迅（1881-1936）等人發起一場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文化運動，楊宜綠受到胡適的五四新文學思想影響甚鉅，「他的生活，和子女教育，一切打破迷信觀念，以符合新時代新科學的需要」。<sup>46</sup>楊宜綠個性剛硬耿直，返臺後常做詩文抨擊時政，內容多為諷刺時政及社會問題，甚為日人所忌憚。此由楊氏於「臺南廢南門墓地事件」中，因仗義直言惹惱當局，而被控以寫匿名信煽動群眾的罪名，被判入獄十月一事，可見其人如何發揮輿論力量以對抗殖民者。盧嘉興記錄楊宜綠與此事件相關的事蹟中，還特別述及「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經過。該協會曾對臺灣社會傳遞了進步的理念與價值觀，乃是當時的文人有鑑於揭竿起義、武力抗暴終歸難免繫獄慘屠之災，轉而「深知欲達到革命，必須喚醒民眾，需要先從宣傳開始，涵育民族精神」，在此意識之下所成立的文化與政治團體。<sup>47</sup>楊宜綠曾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的中央委員，與該協會關係密切。盧嘉興藉由書寫楊宜綠，呈現一個出身於傳統的文人，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洗禮之下，勇於利用近代新聞媒

44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日治時期為臺灣倡設詩社的林湘沅〉，《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頁655。

45 盧氏於文中共抄錄林湘沅至今尚遺存的詩詞數十首，參見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中冊，頁657-680。

46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民初臺南抗日詩人楊宜綠〉，《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冊，頁767。

47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民初臺南抗日詩人楊宜綠〉，《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冊，頁745-750。

體為公器，鼓吹民族精神、批判殖民政府的形象。

日治時期，文人們在感受到日人的同化政策將危及漢文的傳承，以及固有文化的流失，除了如林湘沅之倡立詩社，以詩學維繫文士之間的同氣相應，還有從「普遍化」的思考角度切入以保存中文及傳統文化者，如謝國文。

謝國文年幼時期便開始接受父親謝友我（1869-1926）及季叔謝竹軒（1892-1959）的啟發，於國學及詩學均打下深厚基礎，從盧氏文中羅列甚詳的謝氏作品中可見。29 歲（1915 年）時，謝氏又與楊宜綠同赴日本深造，遂有機會參與由林獻堂（1881-1956）擔任會長的「新民會」，並經常發文揭發臺灣時政的弊端以及社會病態，積極投入抗日民族運動。爾後，思及燈謎有通俗易懂之特性，且容易影射事物或文字，在日本人監管甚嚴的氛圍中，當有助於中文的存續以及文化的保存，遂大力提倡燈謎活動。盧嘉興〈熱愛祖國提倡燈謎保存國粹的謝國文〉云：

（謝國文）認為保存中文尚需普遍化，但和日本所施的政策相背，為能普及一般民眾，喚起大家興趣，又免受日政府所忌起見，他著眼於燈謎。因燈謎雅俗都有，且能隱射，並能使臺民對於祖國事物有所認識以免受日政的同化，所以寓燈謎來保存我國的文化別具苦心。<sup>48</sup>

謝氏察覺日人殖民臺灣期間，對中文的限制日益嚴重，為保存中國文化於不墜，於提倡詩學之餘，且思及利用有趣的燈謎活動以維持臺民對中文的興趣。盧嘉興依據謝國文長子謝汝川所提供的珍貴遺稿中，爬梳得到許多當時舉辦各種燈謎活動的資料及作品，亦可見當年燈謎活動的發展盛況。<sup>49</sup>

語言對於文化的存續有著無比重要的功能，因為語言往往代表著民族的意識與自覺，也代表著對原有文化價值的認同；語言一旦被滅，民族也就形

48 盧嘉興，呂興昌編校，〈熱愛祖國提倡燈謎保存國粹的謝國文〉，《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冊，頁 928。

49 盧嘉興，呂興昌編校，〈熱愛祖國提倡燈謎保存國粹的謝國文〉，《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冊，頁 928-968。

同被滅。日治時期的文人對於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緊密關係有著明確的認識，他們堅持不屈從於殖民者的權力之下，立基於傳統，也願意擁抱現代思想，努力不懈地保護固有文化。從盧嘉興所撰寫上述幾篇人物行傳看來，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愛國意識與民族精神皆足以為後人的榜樣。

### 參、盧嘉興撰寫歷史人物傳記的動機

依據上文整理而得的有關盧嘉興撰寫人物傳記的幾項特點，以下結合盧氏的生平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對其寫作動機做進一步的觀察。

#### 一、為其多面向的田調成果，尋求發表空間

如果依照作品的發表時間順序來看，1965年似乎是盧氏研究方向由鹽場轉向人物研究的分水嶺。他一系列記載人物行傳的文章應該是始於悼念石暘睢的〈文獻導師石暘睢先生〉，<sup>50</sup>於1965年6月發表於《南瀛文獻》，<sup>51</sup>隨後又於1965年8月發表了〈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在這之後便幾乎是以每月一文的頻率發表於《古今談》，這種情況大概持續到1972年。

根據盧嘉興在〈文獻導師石暘睢〉文中所述，可知早在1937年，年方19歲的盧嘉興服務於臺南市歷史館時，受到石暘睢的啟發與教導，早已和鄉土文獻史料結下了不解之緣。石氏不僅教其整理文獻的知識，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供他參考，在歷史館期間他完成了「臺南十二勝景圖」。之後，盧氏又輾轉服務於臺南市市役所土木科營繕係，於1944年便負擔起設計修建赤崁樓的工程，在石氏的指導下成功挖掘出普羅遮城史蹟。<sup>52</sup>從他自編的著作一覽表來看，其首篇正式發表的論文是1951年刊登在《臺南文化》創刊號的〈赤崁樓修復記〉（一），可說是他於1944年承擔赤崁樓修建工作

50 該文據盧嘉興「已發表著作一覽表」的記錄，同時收錄在《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不過，實際上是收在第二十四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84年4月）。

51 盧嘉興，〈文獻導師石暘睢〉，《南瀛文獻》，第10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5年6月），頁27-28。

52 盧嘉興，《南瀛文獻》，第10卷，頁28。

的初步報告。<sup>53</sup> 1947 年又輾轉任職於鹽務總局臺南製鹽總廠直到 1981 年，從 1953 至 1964 十多年期間陸續發表多篇與鹽業相關的論文，大都是鹽場或鹽務的考察心得，比較早期的作品有〈臺灣古鹽場考—瀨口與洲仔尾〉、〈臺南縣鹽場史略〉、〈臺南市鹽場沿革誌要〉等，應該與作者任職臺南鹽場鹽埕場務所有關，之後他因轉到布袋鹽場新塭及虎尾寮等鹽村服務，所以又發表了〈蚊港與青峯關考〉、〈大田、洲南、洲北等場舊址新考〉、〈八掌溪與青峯關〉等文章。由上可見盧嘉興的研究成果與其職場工作基本上存在著密切關係，至少其研究主題有很大成份是受到職場工作的啟發。

其他的研究成果則有賴「在外奔波，造訪有關人士蒐集資料，或探訪實地作田野調查」而得。<sup>54</sup> 在與石暘睢等人組成五人小組期間，曾進行了許多踏查抄錄古碑文的工作。歷時兩年之久，共抄錄了 112 件之多，爾後文獻會將這批成果輯成《臺南縣古碑志》。1958 年又與石暘睢等人組成「臺南市文獻委員澎湖歷史文物考察團」，在澎湖作為期 5 天的考察。<sup>55</sup> 可知任職鹽廠期間，盧氏仍舊持續利用公餘時間進行文史考察工作。

正因為多年來不間斷地以「荒山尋墓碑廳堂覓神主」<sup>56</sup> 的治學方法進行文史研究，也為他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考察成果。這些考察成果曾經主題式地發表過，如〈臺南縣古地名考〉，盧氏以「臺灣歷史雖暫，然古地名已失傳者亦屬不少」，雖已有漢人來臺的早期圖籍公諸於世，如日人田中克己以清

53 盧嘉興，〈赤坎樓修復記〉（一），《臺灣研究彙集》第 20 輯（臺南市：述者自印，1980 年 5 月），頁 116-118。另於 1953 年發表〈赤坎樓修復記〉（二），《臺灣研究彙集》第 20 輯，頁 119-122。

54 參考黃天橫〈盧嘉興先生其人其寫作〉，載於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冊，未注頁碼。另據盧氏於〈臺南縣十大氏族〉文末所記：「本縣氏族除上述十氏族外，望族尚有官田陳……白河李等頗多，因分佈於各地，調查非易，筆者本文僅調查上列十氏族，奔波各地歷年已久，且以個人經濟有限。此次赴各地調查車資蒙興南客運公司免費招待，而到達各地並蒙各氏族中之長輩及各地父老不吝賜教，同時提供各該氏族有關珍貴資料，始得順利完成」，載《南瀛文獻》，第 4 卷下（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8 年 6 月），頁 40。文字中盧嘉興道盡自己在缺乏經費的情形下，獨力進行田調研究的萬分艱辛！

55 賴建銘，〈石暘睢先生年表〉，《南瀛文獻》，第 10 卷，頁 47-49。

56 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頁 11。

人杜臻所著《粵閩巡視紀略》為底本所著之《鄭氏之臺灣地圖》，及《康熙初年墨繪臺灣軍備地圖》等，然而當中「所記載之地名中現已頗多失傳，或有欠明瞭而較生疏者」，因此盧氏耗費數年蒐集明鄭時期地名之相關資料，並利用公餘時間，親自前往各明鄭時期地圖上所載地名之相關位置進行採訪，藉以「探勘其失傳地名之消失原因，以明瞭明鄭時期之地理形勢與漢人移徙開拓情形」。<sup>57</sup>此文乃就其已考得之臺南縣古地名成果的先行發表之作。

由上可知，盧氏對於臺南縣之地理變遷情況有其深厚的認識，而一篇篇的人物傳記則是他進一步將其田調成果，融入歷史人物的事蹟與掌故之中的平台，並藉以將明鄭以來臺灣的歷史與地理脈絡勾勒得更加具體。除了前文提及的藉由書寫何斌、曹謹、姚瑩之傳記，將其對於鹿耳門地理演變的考察成果融入其中，我們另外也可從〈記臺灣清代最豪富的鹽商吳尚新父子〉<sup>58</sup>看到，盧嘉興藉著書寫清人吳春貴、吳尚新父子，於臺南、嘉義承辦食鹽販館致富的事蹟，融入自己早期對臺灣鹽務的專業知識，以及對於臺南、布袋二地鹽場的考察成果。

## 二、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避禍白色恐怖

本文貳之四節，點出盧氏傳記人物中的傳主，皆「普遍具有鮮明之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操」，何以如此？如果進一步結合盧嘉興所處時代的社會處境進行觀察，可推測得知盧氏所以如此密集為文來談論各種人物的貢獻與德性，並強調其愛國情操，大概一方面是為了呼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民族教育」的宗旨；另一方面，身處戒嚴時期的盧氏，仍持續從事其所熱愛的文史工作，然為文立說之際若想免遭誣陷之禍，選擇表彰人物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操之主題，無非是明智的選擇。以下就此二部分加以說明。

57 盧嘉興，〈臺南縣古地名考〉，《南瀛文獻》，第6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9年12月），頁1。

58 盧嘉興，〈記臺灣清代最豪富的鹽商吳尚新父子〉，《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頁164-167。

### （一）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盧嘉興〈臺灣偉大的史學家連雅堂〉當中有一段按語：

臺灣以延平王鄭成功懷民族大義，恢復故土，立德於先。劉銘傳整武經略抗法保臺，建設臺灣定長治之策，立功於次。至於立言者是誰呢？便應該推連氏了。<sup>59</sup>

可知立德、立功、立言，正是盧氏撰寫臺灣歷史人物傳記的三個撰述重點，分別是以鄭成功、劉銘傳、連雅堂為重要代表人物。只不過，不管是立德型人物，或是立功型、立言型人物，盧嘉興對其行為表現的評價，基本上都不脫「具民族意識」、「富愛國情操」之類的讚詞。

為何如此？從盧嘉興的人物傳記中或許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1969年時任鹽務局長的朱玖瑩，曾轉贈盧氏一份「大埔石刻」的拓本，為此，盧嘉興寫了〈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與董應舉〉，盧氏除了盛讚這份文獻的價值，且云：

自由中國軍人在最前線捍衛國土，且時時刻刻和共匪博鬥中，尚不忘響應 蔣總統所提示的文化復興運動號召，將戰地所遺存的文化勝蹟介紹給後方。不惜化費重資拓製成本，並為宣揚沈氏的功績而刊行，……共匪以紅衛兵來毀滅先人史蹟，號為「掃除封建殘餘渣滓」，和我方為保存固有文化而努力，是很好的兩個不同思想，不同政策的對比。……匪區裡面受奴役的七萬萬同胞，都盼望我王師早日揮戈西指，屆時就是處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同胞得獲拯救的時候，同時也是搶救遭共匪所踐踏、蹂躪並摧毀原有文化的時候……<sup>60</sup>

上文點出了盧氏撰寫此文的用意，應是與當時剛開展未久的「中華文化復興

59 盧嘉興，〈臺灣偉大的史學家連雅堂〉，《臺灣研究彙集》第 18 輯，頁 21。

60 盧嘉興，〈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與董應舉〉，《臺灣研究彙集》第 3 輯，頁 9-10。

運動」有關。江燦騰也曾對盧嘉興《臺灣研究彙集》第一輯出版於1966年12月10日的時間點感到好奇，因為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公佈時間只差了近一個月。盧嘉興雖於第一輯的目次頁自述，此編乃是為了紀念母親逝世二週年而作，但是該輯所收錄的第一篇文章卻是〈臺灣的國民運動史略〉？仔細推敲之下，江氏指出「（《臺灣研究彙集》）第一輯的出版，應該是呼應官方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試探風向球成份較大。」<sup>61</sup>此推測與筆者的觀察有切近之處。

不過，依筆者的淺見，盧嘉興著文呼應此運動的時間點恐怕更早，大概是從1965年7月發表〈鄭成功與臺灣的王城〉時就已經開始了。明末鄭成功率領的大規模抗清軍事行動，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開端。從鄭成功擊退荷蘭殖民者以來，不僅使臺灣成了國族紛爭的焦點，從此「鄭成功所投射的歷史形象就有多重意義」。這些多重意義包括：成為臺灣最早的反殖民功臣、是明遺民中最具忠義氣節的代表、是臺灣移民事業的重要開拓者。「鄭成功的家世、功業所烘托出的跨國、離散色彩，他壯志豪情下的草莽精神，還有歷史命運加諸於他的鬱憤無奈，多少年後，已經融為臺灣主體想像的重要資源。」<sup>62</sup>從這個角度看來，盧嘉興所發表一系列的臺灣人物傳記，當中其實也暗藏著細膩的國族思維。

另一方面，熱愛史蹟文物的盧嘉興，眼見皇民化時期臺灣文物受日人摧殘，此時正好又遭遇彼岸假「掃除封建」之名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彷彿是「新仇加上舊恨」，擁護蔣氏政權所代表的「王道仁義」之師，以拯救大陸苦難同胞並且搶救遭踐踏、蹂躪的原有文化，乃是義無反顧之事。根據林果顯的研究，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的重點工作之一，除了培育民族文化，還要培養愛國精神與學習「國

61 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人文研究學報》，第56期，頁6。

62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28-29。

父思想」。<sup>63</sup> 盧嘉興筆下，不管是抗日護臺的丘逢甲、貞烈殉死的五妃、忠貞將領蔣鳳、攻臺剿寇的沈有容、重道崇文的林朝英、抗日詩人楊宜綠、倡設詩社的林湘沅、提倡燈謎以保存漢文的謝國文等等，這些人物的事蹟表現正好都能夠做為提振民族精神的榜樣。

1980 年，退休的前二年，盧氏又發表〈明鄭時來臺開拓的陳登昌與其後裔〉，在他自編的「已發表著作一覽表」看來，算是最後一篇論文。陳登昌是鄭成功入臺之後，不願受異族統治因而拋鄉離井來臺的沿海富豪大戶，盧嘉興結合陳登昌的墓碑及陳氏後代子孫所提供的族譜，憑著自己多年來累積的深厚考古經驗與成果，探究陳氏渡臺墾荒及其後代子孫的發展事蹟，並且細密考索北臺灣大龍峒港墘望族的陳家，與臺南的陳登昌家族的關係，最終得到南北二陳實為同宗的結論。<sup>64</sup> 文末，盧氏云：

其（陳登昌後裔）繁衍情形亦可作為當時隨鄭成功及子鄭經移徙來臺軍民開拓演進的寫照，並可以明瞭臺灣和大陸人民的血緣關係了！<sup>65</sup>

文復會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以道統強化臺灣在中華文化的正統性，並藉由強調臺灣與中國淵源的方式，將中華文化深植於臺灣。」為此，文復會還策動大量編印臺灣文獻的工作，藉以「從歷史、血統、宗族等方面加深臺灣與中國的關係。」<sup>66</sup> 盧氏探求臺灣南北二陳同宗事實，藉以指出臺灣與大陸人民之間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看來相當切合文復會此一任務的目的。

## （二）避禍白色恐怖的明智之舉

自 1949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起，至 1987 年蔣經國

63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頁 133-134。

64 盧嘉興，〈明鄭時來臺開拓的陳登昌與其後裔〉，《臺灣研究彙集》第 21 輯，頁 1-39。

65 盧嘉興，〈明鄭時來臺開拓的陳登昌與其後裔〉，《臺灣研究彙集》第 21 輯，頁 38。

66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頁 136-137。



宣佈解嚴止，臺灣百姓經歷了長達 38 年被稱之為「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同處此政治暴風圈之中的每一個人，生命皆承受著極大的風險。侯坤宏根據李敖的資料指出，臺灣從 1950 年代至 1987 年為止，一共發生了 29,000 多件的政治案，總計有 14 萬人受難，遭處決者有 3,000-4,000 人。<sup>67</sup> 在這個思想及行為被政府嚴格管控的年代，各行各業都很難倖免於難，時時刻刻都得謹言慎行，比如將作品形諸文字的作家，便要仔細斟酌哪些內容可寫，哪些內容不能寫。於 1961 年以叛亂犯被捕的施明正，在短篇小說〈鼻子的故事·（上）—成長〉中，提到以下一段話：

我記得在二十八歲被捕之前，我幾乎除了天主、父母、老師之外，什麼都不怕的。……想到興高彩烈地盼望著的光復後，充滿那麼多我目擊嗅聞，體驗過的時代血腥風味，由於怕關、怕被暗殺、怕再次坐牢很有可能死在牢中，只好有限度地挫鈍我的利筆，甚或乖乖地接受善意的恐嚇，寫些無害而次要的；把那主要的、有力的讓到更為祥和、和諧、更為開明的年代，再執筆。<sup>68</sup>

牢中的恐怖經驗，迫使這位曾被鍾肇政譽為「狂才」<sup>69</sup>的作家，收斂起自己原有的「利筆」，只敢寫些「無害而次要」的文章。正可見文字創作者處此白色恐怖時期的艱難處境。

在一場「盧嘉興學術研討會」的綜合座談中，與盧嘉興在臺鹽共事過 3 年的張復明提到，盧嘉興對於政治上的敏感議題總是保持沈默，寫作文章時也要「迎合政治上的正確性」。<sup>70</sup> 可見盧嘉興開始寫作一系列的臺灣歷史人物傳記，除了前述可能與呼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展有關，另一方面，這種符合政治正確的寫作方向，也比較能夠避禍。第 1 篇文章〈鄭成功與臺

67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2007 年 6 月），頁 143。

68 施明正，〈鼻子的故事·（上）—成長〉，《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頁 138-139。

69 鍾肇政，〈施明正與我〉（序），《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頁 13。

70 顏銘俊記錄、邱敏捷審稿，〈附錄：「臺南學的重要先驅——盧嘉興學術研討會」綜合座談紀錄〉，《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2022 年 10 月），頁 64。

灣的王城〉於 1965 年 6 月發表於《古今談》第 5 期，以鄭成功做為第 1 號書寫人物，也相當符應當時政府當局企圖把臺灣「再中國化」<sup>71</sup>的政策考量，因為「鄭成功作為一個明末清初的歷史人物，一直都給後代『堅毅反清』、『驅逐異族』與『恢復故土』的形象，因此鄭氏意象能給臺灣帶來『再中國化』的文化符碼」。<sup>72</sup>

總之，盧嘉興傳記人物書寫選擇以鄭成功做為第一人，之後接著書寫由鄭成功輻射出去的明鄭歷史人物，正能展現其國族認同思維與政治方向的正確性，至於所寫清朝時期對於臺灣之守護與發展卓有貢獻的歷史人物，則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不僅對臺民有所激勵，並提供了許多學習的榜樣以促進政策的推行，無疑也可視為一種明哲保身之舉。

#### 肆、結語

礙於篇幅及個人學力所限，本文無法對盧氏所寫五十七篇人物傳記逐一詳加探討，僅就筆者觀察過程中較有心得的部分加以表述。身為一個文獻學家，除了盡其所能地進行客觀有據的田調研究，充份實踐其與南縣文獻會同好石暘睢等人所共同倡議的文史踏查工作的核心訴求，並且十分勤於發表成果。其所書寫之人物傳記，實在留存了極豐富的臺灣史料，雖然內容不免駁雜，然對於後人瞭解明鄭以迄日治時期，這些人物在臺灣的歷史表現以及當時社會的種種樣貌，實在功不可沒。綜觀盧氏的一生，1918 年出生的他，經歷過日治時期被殖民的迫害，以及光復之後的政局變化，處在這種政治緊張、言論不自由的年代，作者在人物傳記中除了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有不得

71 1662 年至 1683 年鄭氏政權帶來大批中國漢人移民，並建孔廟興儒學，使臺灣初次受到中國文化薰陶；1683 年至 1895 年的清領時期，隨著更多的漢人移民進入臺灣，中國文化也更大批地移植入臺，甚至形成臺灣本土的漢人文化。這些都是「中國化」的實踐。而日治時期結束後又重新帶回中國意識，於是產生「去日本化」伴隨「再中國化」的現象。參見蔡明賢，〈戰後臺灣的國家權力運作與再中國化（1945-1947）〉，《修平學報》，第 35 期（2017 年 9 月），頁 79。

72 蔡明賢，〈鄭成功意象與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63）〉，《人文研究學報》，第 51 卷第 1 期（2017 年 9 月），頁 86。

不為的曲筆或者刻意的迴避，可說是這一時代文化人的共同悲哀。他為連雅堂立傳時曾把這種難言之苦藉以一吐為快。除了極力讚揚連氏完成《臺灣通史》的成就，也為該書出版之後受到許多的指摘感到不平，對於曾經有人譏笑連橫書中隻字不提割臺之後的史實，盧嘉興做了如下的辯護，云：<sup>73</sup>

至於對日據後的史實隻字未述一節，實在是失于批評過苛。  
以處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怎樣能執筆來寫？是寫日人的好處呢？  
還是當著日人的面前罵日人的不當呢？連氏不是不續寫，因為所  
處的環境不適時宜。

盧氏在此便很直接明白地點出編史者需面對的艱困處境，日治時期的處境如此，光復之後國民政府對於百姓言論的箝制所帶來的影響，當也是如此地令文史工作者感到不堪。

在資料的援引上，盧氏頗能多層面的接觸與參用，如考證何斌事蹟時能同時參考西方學者的論述，如引用德國重要史學家路德維希·里斯的史料，重新看待何斌的歷史定位，帶出了不同於前人的見解，亦可見其具備不拘泥陳說的開闊性研究視野。不過，也由於時代性的限制，盧氏所引用的資料也未必都是理想的，因而載錄了有待商榷的內容，比如〈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文中有不小篇幅述及林朝英與蔡牽和林清之間的故事，可能就是採錄了鄉野傳奇或者老的故事。<sup>74</sup>

73 盧嘉興，〈臺灣偉大的史學家連雅堂〉，《臺灣研究彙集》第18輯，頁21。

74 林氏族譜編輯委員會，《一峰亭林朝英行誼錄》（高雄：美育印刷，1980年），頁87-93。

## 參考書目

## 壹、專書

Ludwig Riess 原著、姚紹基編譯，《福爾摩沙島史》。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林氏族譜編輯委員會，《一峰亭林朝英行誼錄》。高雄：美育印刷，1980 年。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5 年。

施明正，《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 年。

盧嘉興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中下三冊）。臺南：臺南市藝術中心，2000 年。

## 貳、期刊論文

石暘睢、吳新榮、盧嘉興、朱鋒、江家錦，〈南縣古碑零拾（一）〉，《南瀛文獻》，第 2 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5 年 6 月），頁 124。

江燦騰，〈盧嘉興先生的學術研究導論：為何他是臺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22 年 10 月），頁 1-22。

邱敏捷，〈盧嘉興的臺灣佛教研究〉，《臺灣文獻》，第 74 卷 2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3 年 6 月），頁 241-270。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2 期（臺北：國史館，2007 年 6 月），頁 139-203。

- 張復明，〈盧嘉興臺灣鹽業研究論文之回顧與補述〉，《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國立臺南大學，2022 年 10 月），頁 43-55。
-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 卷 3 期（1997 年 9 月），頁 43-87。
- 黃靖惠，〈走過日據、臺灣光復；走過鄉野、鹽田烈日：臺灣文史學人盧嘉興〉，《社教雙月刊》，第 117 卷（2003 年 10 月），頁 61-64。
-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史料叢集之二：藻臣遺錄〉，《臺南文化》，3 卷 3 期（1953 年 11 月），頁 78-88。
- 蔡明賢，〈鄭成功意象與臺灣的再中國化（1945-1963）〉，《人文研究學報》，第 51 卷第 1 期（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17 年 9 月），頁 85-108。
- 蔡明賢，〈戰後臺灣的國家權力運作與再中國化（1945-1947）〉，《修平學報》，第 35 期（臺北：修平科技大學，2017 年 9 月），頁 77-110。
- 盧嘉興，〈文獻導師石暘睢〉，《南瀛文獻》，第 10 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5 年 6 月），頁 27-28。
- 盧嘉興，〈臺南縣十大氏族〉，《南瀛文獻》，第 4 卷下（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8 年 6 月），頁 33-40。
- 盧嘉興，〈臺南縣古地名考〉，《南瀛文獻》第 6 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9 年 12 月），頁 1-20。
- 賴建銘，〈石暘睢先生年表〉，《南瀛文獻》，第 10 卷（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65 年 6 月），頁 47-49。
- 戴文鋒、楊家祈，〈以多元觀點探討盧嘉興之明鄭無奉祀媽祖論〉，《人文研究學報》，第 56 期（國立臺南大學，2022 年 10 月），頁 23-41。

## 參、盧嘉興發表於《臺灣研究彙集》之文章

盧嘉興，〈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臺灣研究彙集》第 2 輯。盧嘉興，1967 年 4 月，頁 1-10。

盧嘉興，〈明鄭忠貞不二的將領蔣鳳〉，《臺灣研究彙集》第 2 輯。盧嘉興，1967 年 4 月，頁 18-20。

盧嘉興，〈明季剿倭寇最先攻臺灣的沈有容〉，《臺灣研究彙集》第 3 輯。盧嘉興，1967 年 7 月，頁 33-40。

盧嘉興，〈由「大埔石刻」談到沈有容與董應舉〉，《臺灣研究彙集》第 4 輯。盧嘉興，1967 年 10 月，頁 9-13。

盧嘉興，〈有賢名的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臺灣研究彙集》第 4 輯。盧嘉興，1967 年 10 月，頁 14-21。

盧嘉興，〈清末臺灣繪梅的藝術家郭藻臣〉，《臺灣研究彙集》第 5 輯。盧嘉興，1968 年 3 月，頁 13-18。

盧嘉興，〈盧許綢女士法號錦妙滅度四週年紀念〉，《臺灣研究彙集》第 8 輯。盧嘉興，1969 年 7 月，頁 30。

盧嘉興，〈清代臺灣藝術家林朝英〉，《臺灣研究彙集》第 13 輯。盧嘉興，1973 年 6 月，頁 1-6。

盧嘉興，〈引導鄭成功光復臺灣的何斌〉，《臺灣研究彙集》第 17 輯。盧嘉興，1977 年 8 月，頁 90-91。

盧嘉興，〈臺灣偉大的史學家連雅堂〉，《臺灣研究彙集》第 17 輯。盧嘉興，1978 年 7 月，頁 17-21。

盧嘉興，〈建設臺灣南部水利的曹謹〉，《臺灣研究彙集》第 17 輯。盧嘉興，1978 年 7 月，頁 74-80。

盧嘉興，〈紀若羅與德元巷〉，《臺灣研究彙集》第19輯。盧嘉興，1979年7月，頁46-58。

盧嘉興，〈赤崁樓修復記〉（一），《臺灣研究彙集》第20輯。盧嘉興，1980年5月，頁116-118。

盧嘉興，〈赤崁樓修復記〉（二），《臺灣研究彙集》第20輯。盧嘉興，1980年5月，頁119-122。

盧嘉興，〈盧嘉興已發表著作一覽表〉，《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盧嘉興，1981年2月，頁47-50。

盧嘉興，〈記臺灣清代最豪富的鹽商吳尚新父子〉，《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盧嘉興，1981年2月，頁164-167。

盧嘉興，〈明鄭時來臺開拓的陳登昌與其後裔〉，《臺灣研究彙集》第21輯。盧嘉興，1981年2月，頁1-39。

#### 肆、數位資料

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文苑〉，《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網址：<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67479#p68>，檢索日期：  
2023年3月15日。

#### 伍、其他

顏銘俊記錄、邱敏捷審稿，〈附錄：「臺南學的重要先驅 --- 盧嘉興學術研討會」綜合座談紀錄〉，《人文研究學報》，第56期（國立臺南大學，2022年10月），頁57-73。

## Compilation Features and Motivation of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aiwan by Lu Chia-Hsing

Yang, Shu-tzu\*

### Abstract

Lu Chia-Hsing, an important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Tainan studies, has a very diverse range of research and has accumulated fruitful results. So far,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historical sites research, religious belief investigation, and Taiwan salt industry, while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igures is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the personal "List of Published Works" compiled by Lu Jia-xing, the author found that between September 1965 and June 1972, he had intensively written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lmost one article per month, and related articles were still published until 1980,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is past research topics, this phenomenon deserve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 summarize the compilation of Lu's biographies, and combin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to explore his motivation for writing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Keywords : Tainan Studies, Lu Chia-Hsing, Historical Figures in Taiwan ,Biographies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UTN.